

美國問題與國際問題的關聯

陳明

由於國際間緊密的經濟與政治關係，以及相互依賴關係，任何國家本

身的內部問題和國際問題都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國際問題與世界問題也就成爲連鎖性的問題。美國居世界的領導地位，其影響力遍及世界

角落，美國問題與國際問題因此更是相互關聯，緊密連鎖。如果我們用世界能源危機問題作爲例子，它立刻影響到美國的能源問題，能源的缺乏迫使原油和汽油價格高漲，美國人不得不減少購買汽車，少用私人車子。汽車的減少使用，影響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等等的減產，因而造成數以萬計的汽車工人被解僱。其他的工業也受到能源危機的打擊，較顯著的如鋼鐵工業，因能源是煉鋼的原料，工廠倒閉，失業率高昇，造成了美國經濟的全面不景氣，於是改變了美國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影響了「價值」觀念，如士氣精神、道德標準和社會秩序等。也可以說是改變了美國的國民性，因而影響了美國的社會結構，政治行爲，甚至政治體系中的權力結構也隨之而改變，進而影響到美國的國家行爲，政府的對內與對外政策。特別是美國對外政策，關係到許多國家的利害與安危。因此，美國問題也就成了世界性的問題。以上所說的關聯性的問題及其產生的影響，就是我今天所要講的連鎖政治行爲。我想各位從自己日常生活當中所接觸到，從我們的親戚朋友中，或者是直接間接從我們的工作崗位上，公私兩方面以及家庭學校種種關係中，可以發現我們每個人與美國所發生的關係，要遠超過於與世界其他國家所發生的關係要密切。我們假設當世界能源危機發生之後，在美國究竟產生了那些影響。我們不能只用一句話說：「它影響了美國工商業的不景氣，因此影響到世界各國的經濟狀態。」這種說法當然是沒有錯，不過還不能看出它的連鎖性，對世界問題和國際問題的影響。譬如說中南半島對於中美的關係如何，正由於另外一個世界問題的造成，他要有所變更，我們還看不出他

的連鎖性來，我們要一步一步的找出他的根源。現在，讓我們試試探討這些問題的關聯。我首先要談的，就是能源問題所造成的製造業的不景氣和失業問題。

第一、製造業的不景氣和失業問題——能源問題使製造業的生產量不

斷下降，業主對於是否再投資猶豫不決。因此，只好一再裁減員工，尤其是汽車工業，對於石油價格的上漲最爲敏感，截至目前爲止，汽車工業的生產量已削減四分之一，創下了十四年以來生產量的最低點。至於銷售量，則從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五百餘萬輛銳減至一九七五年的八百餘萬輛。僅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其他公司不算，就造成了五萬二千名汽車工人的失業，將所有跟汽車工業有關聯的工業加起來，總共達成了四〇%的工人失業，這兩個數字是非常嚴重的，促使美國在國際上的行爲大大的改變，這是主要原因之一。

製 造業的不景氣，也間接影響到其他輔助工業的蕭條。例如通用電器

公司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主要器材製造廠，在今年一月中旬從一萬八千名員工中辭退了五千四百名。又如美國鋁業公司的減產，使得爲數一千名的工人失去工作，還有天然氣瓦斯的減產，使得美國鋼鐵公司在匹茲堡地區的四個工廠辭退了一千三百名工人，另外有五百名可能在最近被辭退。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報導，自去年八月以來，美國失業人口增加了二百八十萬，其中大部分是受能源問題的直接影響，據統計資料顯示，這是一九四〇年以來失業人口增加最快速的五個月。截至今年二月，美國失業人口已達七百五十萬，佔就業總人口的八·二%，創下了一九四〇年以來的最高百分比。根據官方及經濟學家的估計，此後數月失業人口將繼續增加，可能達就

業人口的八·五%至九%。我們國內也有經濟學家認為可能會增加到十%。我在這裏附帶報告幾個先進國家的數字作為參考，澳洲失業率是五·五%，法國是五%，英國是四·二%，義大利是三·五%^①。同時美國通貨膨脹也相當驚人，汽車上漲二〇·六%，糖上漲二七四·五%，食用油上漲五〇%，飲料上漲四二·四%，電費上漲二二·一%，成衣上漲七%，這些數字證明了另一種解釋——在一九六六年，即九年之前，一元美金可以買一元美金的東西，今天拿一元美金只能買六角三分錢的東西^②。這樣看來美國物價上漲還不太厲害，假使與世界來比，美國今天的物價上漲的確不算太多。但對美國人來說，物價突然上漲且超過了百分之七或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件非同小可的事。過去美國的物價漲上去之後總會再降下來，這一次漲上去之後，大多數沒有回跌。

除了工人之外，美國農民也有他們自己的問題。早在三十年前，美國的農產品價格就開始下跌，但是農民所需的化學品肥料，和農耕機器的價格，卻因能源價格高漲而一再上升，使農民的生活水準在過去三年中是相當的低，和一般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相較之下是更為低落。因此，發生一個問題，即今後的農產品是增產還是減產？雖然美國聯邦政府一再想盡辦法在各種措施方面來鼓勵他們增產，但到目前為止，還不能看出來這個價格會平穩下來，對農產品增產會有信心。

第二、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消費者由於工作沒有保障，都盡量壓縮家庭預算，維持最低生活水準，減少不必要的開支。由於消費者生活方式的簡化，又連帶的造成許多商店的倒閉^③。如美國格蘭公司在今年一月份關閉了二十六個分店。同時零售商也察覺到顧客心理的變化，他們要求更好的品質以及最低廉的價格，除此之外，許多美國人已經開始購買便宜的罐裝食品，而不願花更多的錢來購買新鮮食物。由於工作機會減少，收入也就降低。過去美國人進商店買東西，不大考慮價錢多少，現在一定要買便宜的東西，餐館業也大受影響。講到餐館，各位一定會連想到我們的華僑和留學生，我曾特別去看了好幾個餐館，生意非常清淡，這對我們華僑與留學生的生活影響很大。

一般人民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也都減少他們外出旅遊的次數，使得旅遊觀光事業大受影響，特別是造成航空公司的財政困難。例如，美國國內航

線的主要航空公司——聯合航空公司辭退了五九九名員工，並削減了四十八架飛機的航行次數，以減少支出，維持收支平衡^④。像在台北的環球航空與汎美航空公司，環球航空公司是環繞世界飛行，每天有一班飛機，現在却不能這樣做，因而停止了台北與美國之間的航線，讓汎美航空公司接下來，這也就是為了縮短航線，節省能源。

同時家庭生活也成為大多數美國人的再度選擇，因為呆在家裏可以減少消耗汽油，減少出門的消費額。由於美國人民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對自己所涉及的事務逐漸感到不安全，甚至抱着懷疑的態度。現在他們相信最安全的作法就是不做任何事。正由於美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大部分的夫妻都呆在家裏，社會學家預測，人口的數字會上升，離婚的數字會下降。美國人民的生活方式改了之後，整個社會結構也會受到影響，夫妻經常呆在家裏，社交活動就減少了。過去美國人到了晚上多去教會聚會，家長會或參加其他許多社交活動，藉此來作生活上另外一種的調劑。當這種活動減少之後，對社會表示不積極關心，因此，而變成了比較保守的社會行為態度。這種傾向很自然的必將影響到他們處理內政和國際事務的立場與態度。

第三、社會結構的改變——經濟學家預測地方政府將因營業稅和所得稅的減少收入而加深其財政困難，由於財政困難，地方政府不得不裁減維持地方治安的警察、消防人員的數目，以及縮減各項服務性機構，其中警力的減少，很可能增加已經高昇的犯罪率。社會道德觀念也一天比一天低落，根據統計，十年以來美國的犯罪率增加一〇四%，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的增加比率遠超過成年罪犯。

各地學校的經費因為地方和州政府的財政困難而削減，其結果造成教育工作者人員的裁減及課外研究和發展課程的減少，有的學校，特別是私立教會學校，不得不將土地建築物、學校設備租給民衆，以增加收入，平衡收支赤字。例如喬治華盛頓大學將辦公室樓出租，瑪里蘭大學將地下室整修為遊樂場所，這樣不但償付了一些開支，更可以加強學校和社會的聯繫。大學學生入學人數雖減少，却比較用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出去找工作需要好的成績。現在美國大學生平均每年要花三、五七五元美金，如果照目前的指數繼續上漲下去，二十五年後則要一萬多美元，將不可能是一般家長所能負擔的^⑤。

雖然各級學校因財政困難而減少各項開支，但是有關能源的研究計劃

反而由於實際的需要而增加。福特總統於今年一月間宣佈他將運用總統的權力，撥專款作為能源研究和發展的經費，預期使美國到一九八五年以前每天能產生一百萬桶的合成燃料和頁岩油，並且不再依賴外國進口的石油。

以上所談到的各種型態，顯然地，直接影響到政治體系中權力結構的改變。

第四、政治體系中權力結構的改變——去年十月的期中選舉反映出能源危機所引起的經濟問題，對美國政治體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根據去年十月二十日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了美國選民最關心的是本國的經濟問題，而不是越南、高棉或中東等國際政治問題，尤其是通貨膨脹問題，大家都擔心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將再度出現，他們並且認為民主黨較有能力來處理經濟問題。因尼克森在任內，雖然在外交方面是儘量的求其表現，但對國內經濟問題的處理並不出色。選舉的結果證明選民最關心的經濟問題乃是民主黨在期中選舉大勝的主因⑥。這個事實證明了能源問題影響到社會變動，而社會變動又影響到投票行為，因而形成新國會的特色。

第九十四屆新國會最引人注意的地方，除了民主黨人數的大大增加外

，是新進議員的增多，幾乎有五分之一的國會議員是第一次當選，這在美國政治體系裏面，是一個新的且很少見的特點。其中新當選眾議員九十三位中民主黨佔七十四位。參議員十一位中民主黨佔八位。這些新進議員都比他們所取代的老議員年輕，根據政論分析家的分析，這些新人具有比較自由色彩⑦。因此，我們不難預見新國會在今後二年之內將對美國的政治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無論是內政或國際事務國會都將日漸擔任積極重要的責任，在政策的制定方向上，國會也將和總統分享領導權，這個事實毫無疑問的，將使美國處理問題的常軌發生一些變化。現在特舉實證事例來說明：

(一)在內政方面：新國會偏向較嚴格的商業法規（business regulation）、土地使用計劃（land-use planning）、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consumer protection）、以及薪資和物價的控制（wage-price control）。民主黨深知這次期中選舉的壓倒性勝利，大半由於共和黨無能解決經濟難題，因此民主黨認為他們在國會的議員能否尋求比白宮更好的經濟問題的解決方

案，是決定民主黨政治前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正是明年大選的關鍵所在。

由於經濟問題正成為美國人民最關心的切身問題，共和黨白宮和民主黨國會在爭取人民好感之餘，對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例如，為了扶助工業復甦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福特總統於今年一月十四日建議減少聯邦稅收一六〇億美元，這筆數目相當於一九七四年聯邦總稅收的一二%，這個數字相當大，在過去沒有一位總統這樣做過，現在福特總統這樣做，如果說他是為了討好人民的話，最多提出來不能超過四%，現在居然超過了一二%。但眾議院則認為一六〇億太少，在二月二十七日通過了減稅二一三億的方案。國會如此慷慨，是與自己的國家過去不去？是為了使人民減輕負擔？這種主動是跟總統為難？還是跟人民為難？實際上都不是，而是為自己本黨的利益在作努力。

爲

了減少對石油輸出國家的依賴，福特堅持增加原油進口稅，使每桶增加稅金一元至三元，而國會則認為增加進口稅將增加人民的負擔，並且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加以反對。

福特總統在減稅計劃中附帶說明今年社會安全救濟金的數額將加以限制，這是共和黨傳統的精神，否則，增加太多，會造成貧民好吃懶做。其增加數額以不超過去年的百分之五為限，但國會對這點計劃猛烈攻擊，參議員韓福瑞批評福特這項計劃是「不道德的，虛偽的，不可原諒的，不可接受的，以及沒有良知的」。

總統和國會的意見雖然相左，但經濟問題急待解決，在國會影響力日益增加的情勢之下，總統由於現實環境的逼使，不能不和國會取得協調，因此在國際事務上也就不得不和國會分享領導權，處處遷就國會。就這個觀點而言，國會在對外政策上將擔任過去從未曾擔當的重要職責。

(二)在外交方面：新國會傾向削減海外援助，減少國防支出，尤其是儘可能減少新武器系統的設立，以及海外駐軍的開支。在政治體系上，新國會無疑的將繼續和白宮展開一場權力戰，尤其是有關國際事務的領導權問題。因此國會的積極參與外交事務，對美國處理日趨複雜的國際事務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其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不是如何幫助友邦解決問題，而是儘量使美國本身不捲入和美國沒有直接關係的國際問題中。一九七二年，美國前任國

務卿羅吉斯，曾在一次會議中坦白表示：美國爲什麼要與蘇俄積極談判，爲什麼要想法將國防經費緊縮？尤其是新武器的系統要重新考慮。結果這的確是個大問題。假使我們今天用數字來表示的話，在核子武器上面，美國與蘇俄所競爭的就是一個數字。我們單講戰略方面的核子武器，不包括戰術方面，他們公開的數字，美國有一七一〇枚，蘇俄有二三一〇枚，相差五一〇枚。實際上在效果方面並不表示任何重要性。因爲根據美國國防部所透露的數字，今天美國只要用三分之一還不到的核子力量，假使將蘇聯當做假想的敵，就可以將蘇聯的總工業能力摧毀72%，且用同樣的力量可以摧毀蘇聯74%的人口。今天美國的核子武器與蘇聯的核子武器，幾乎是在數字上面競爭，增加數字就是增加金錢，但並不一定增加質的數字。所以美國感覺到軍費太重，今天美國人民付給政府一元稅金，裏面有六角七分七厘左右是用在軍事費用上。蘇聯更是覺得負擔太重，因蘇聯的經濟比不上美國，而國防預算比率並不比美國小，所以美蘇在這方面有了共同需要的默契，即必須藉談判來限制核子軍備競爭。

我們

我們看看美國對海外援助方面，到底採怎樣的態度？例如，最近高棉戰場的局勢一天比一天惡化，福特總統要求國會迅速批准額外援助三億美元給越南和高棉，但是遲遲未能通過，後來由衆議院議長艾伯特派了八位國會議員在一月二十六日組團前往高棉實地調查，結果這項緊急軍援案還是被衆議院否決了。由此可見，第九十四屆國會在國際問題上表現了比過去更爲冷淡的態度，加上越南戰場上所得的教訓，使美國國會看清楚了一個事實，經過了那麼長的時間，花了那麼多的錢，死了那麼多人，結果還是落得「沒什麼光彩的撤退」。昨天晚上福特總統在他的講話中，含蓄的表示說：「也許美國人這一次不幫助越南高棉。」這對於美國的利害也許看不出有太大的不同，因爲根據國會的看法和民意的反映，越南高棉萬一失去的話，對美國在整個世界戰略方面來講損失很小，但對美國光榮的記錄以及在海外的信用却受到很大的損害。而美國國會却要求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撤軍，這與我們本身就有利害關係，不能將它當做一個美國問題來看，這完全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在去年有幾個數字我想稍微提一下。美國已經在太平洋以及遠東地區撤軍，在韓國減少了二千人，在泰國減少了一萬二千人，在關島減少了六千人，機動海軍部隊減少了七千人，在拉丁美洲減少了二千人，

在歐洲減少了一萬三千人，還有其他地區，美國在海外總共裁減了四萬四千人，美國在海外軍隊的總數是五十一萬八千人，減了四萬四千人已經是減了很多。參院多數黨領袖曼斯斐德，他在去年曾經提出，還要再裁減七萬六千人，表決結果，四十六票對四十四票，差二票沒有通過。以我個人的看法，在目前美國國會的趨勢之下，今年他再度提出，很可能會通過。他主張裁減這七萬六千人最主要的目的，是又可以節省九億多的軍事費用，因爲節省費用正是美國國會的趨向，也是幾乎每一位議員所愛聽、愛說的「政治話」。由於美國在國際問題上表現了冷漠的態度，更使美國人覺得不應再插足於外國事務。因此他們惟恐額外的軍援可能使美國再一次捲入中南半島的戰場，以致進退不得。

同時

同時，根據民意測驗顯示，七六%的美國人不願再介入中南半島的戰場。前幾年在美國任教時，學生總是逼着我談越戰的問題，而且每天都要談。因爲這是男同學的切身問題，隨時隨地都要被征召服役。女同學也很關心這個問題，因爲這與他們的未婚夫或男朋友有關。教授們自由主義比較濃厚一點的也是反對越戰。所以在學校裏上課時談越戰問題，在教授休息室裏也是談越戰問題，上國際問題課和美國政府課時，學生們所問的也是越戰問題。因此，美國人不願意再介入中南半島的戰場，從這些跡象使人不禁要懷疑美國是否仍願意擔任世界的領導者，來解決國際問題了。不過在這裏我願意特別強調一點的，我們懷疑的並不是美國的實質力量，而是他的精神力量，在實質上，世界上沒有其他的國家能像美國一樣擁有充分的天然資源，強大的工業基礎，以及受過良好教育、技能知識水準高的人民，但是美國的精神却在不斷的消退之中。蔣夫人在最近發表的專文中指出：「過去美國所崇尚的自強、堅毅、機敏、智謀、尚禮等美德早已蛻變了。吸毒、貪污、犯罪和謀殺率直線上升，正逐漸腐蝕美國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同時過去十年來，美國青年愈來愈不尊敬權威，愛國觀念也愈來愈淡薄。在他們心目中，世界領袖的地位是沒有意義的。」

根據民意測驗的調查顯示：四二%的美國人不再認爲第一強國有何重要性⑧。因此，今後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的立場，可能較過去軟弱，但也不致回到歷史上的孤立時代。最近季辛吉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年會上曾說：「二次戰役的前二十年美國人認爲美國什麼問題都能解決，但是過份干預國際事

務的結果是什麼都無法解決。因此今後美國的政策將是採取中庸之道，既不担任國家警察，也不過分孤立。」我想這段話可以做為今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第五、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近幾年來國際政治體系的變化，也深深地影響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一九七〇年代的國際政治體系，已

非一九五〇年代的兩極政治體系所能比擬，因此，美國所承擔的對抗蘇俄逐漸成長的核子力量以及團結西歐盟國的責任也比一九五〇年代更為沈重。假如美國在軍事力量上不能有效的平衡蘇俄，那麼美國的勢力範圍和影響力必定縮小，相對的蘇俄却不斷的擴張，加強其影響力。

一九七二年美蘇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是因為美國國內經濟不景氣，美國希望在武器競賽的無止境投資裏，能夠緩和下來，減少軍備競賽，結果美國讓蘇俄在核子數量上居於領先的地位，在心理上美國已經承認蘇俄在國際政治裏平分秋色的地位。因此美國在處理國際爭端和世界問題時，必須和蘇聯協調處理。（美國對外事務一切關係中，與蘇聯直接和間接有關聯的佔七四%。）

最近核子擴散問題逐漸演變成世界性問題，因為核子武器的製造程式已不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據估計本世紀結束前全世界大約有二十個國家有資格參加核子俱樂部⑨。美蘇兩個超級強國已體驗到核子擴散勢必攪亂世界局勢的平衡。在心理上，越是強盛的國家對安全感的渴望越是強烈，在這種情形之下，美蘇兩國勢必要聯合解決核子擴散問題，尤其是防止原子反應器落入恐怖組織的手中。

總而言之，核子武器的擴散，使許多小國及恐怖組織都有可能擁有此毀滅性的武器，加上蘇聯在軍備競賽上及武器談判上都取得了優勢，美國不僅不能單獨處理世界性的危機，甚至需要和蘇聯取得協調合作，共同處理世界問題，這可以說是美蘇「低盪」的基礎。雖然目前美蘇「低盪」氣氛又開始轉濃，海參崴高階層會議在太空科學及其他科技方面都訂有相當的合作計劃，但是美蘇的軍備競賽不可能因此而停頓。因為自艾森豪以來共和黨的總統都相信，和蘇俄談判而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後盾等於緣木求魚。在這裏我想提出一個數字來說明美蘇之間競爭，除了核子武器之外，傳統性的武器仍然在競爭，因為雙方認為核子武器是不能拿出來用的，傳統性武器更要增加

力量。例如飛機美國有五千五百架，蘇俄有五、一五〇架。戰車美國有九千輛，蘇俄有四萬輛。直升機美國有九千架，蘇俄有二千架。攻擊性的潛水艇美國有七十五艘，蘇俄有一百五十艘。戰略性的轟炸機美國有四九八架，蘇俄有一六〇架。從這幾個數字中，可以看出軍備競爭並不完全受談判的因素而停頓。

雖然在今天這個非常現實、非常勢利的國際社會中，世界的權力結構

仍以美蘇兩個超級強國為主，國際秩序主要也是依賴這兩個超級強國來維持，但是美國與蘇俄的「均勢」維持並不是一件絕對的「事實」，正因為這個國際社會是非常現實、非常勢利，國際政治亦因此成為多元性的體系。而美蘇兩國在軍事或政治上的動向都需要顧及到第三國的利益與意向。由於國際關係中相互依賴性的增加，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問題往往很快變成國際性的多邊問題，因此單憑美蘇兩國是不可能完全控制國際秩序。雖然兩超級強國儘量避免全面戰爭，但是相互對峙的局勢却不能消除。我們一定要認清楚，「避免全面核戰並不等於彼此就不敵對，互不競爭」。所以我們相信這是實證——「談判代替對抗」只是當今國際政治中的手段之一而非本質上的必然現象；實質上是談判歸談判，對抗仍是對抗，對抗不但不可避免，而且隨時隨刻都在進行。

美國的力量與目標在過去三十年來一直是世界的一股穩定力量；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相互依賴關係是一天比一天增加，在這裏可以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目前我國是美國的第十三位貿易伙伴。而且我們將會在最短期間變成第十位，這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過去我們強調依賴美國的軍援和經援等等，可是美國也同樣的依賴於我們，且程度是相當的大，美國必須成為這種相互依存關係中的支柱。昨天福特總統特別表示了他對國會不支持對越南高棉戰事援助而深感遺憾。從這一點，我們又印證了前面兩件事——（一）國會在國際事務中的爭取領導可能會引起美國問題之嚴重性。（二）美如採取新孤立主義則更形成國際問題不能解決。我不稱他是「孤立主義」，而是「新孤立主義」，所謂「新孤立主義」，就是不去做世界警察，不去負道義上的責任。

最後我們看看美國到底缺少些什麼？希望做些什麼？先舉幾個代表性的美國領導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認為美國

當今實質力量仍強，遇有困難的時候，還能重新覺醒起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重振其道德精神力量來解決問題。

(一)美國工會主席喬治·閔尼說：「自掃門前雪，以及漠視周遭生活的人們，或者是避免捲入混水的觀念必須要摒除，同時對人類所遭受的痛苦、壓迫和渴望得到幫助的呼喊，都應抱着惻隱之心的態度來處理，助人助是當前美國人應有的認識。」

(二)美國最負盛名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華特·克倫凱說：「美國人民可以藉着他過去輝煌的歷史傳統去重估美國真正的價值。」

(三)紅衣主教約翰·卡洛說：「源遠流長的道德觀是解決美國問題的希望，美國人今日更須依賴宗教教育，及奉獻的精神去分辨善惡是非。任何關心國家前途及個人的倫理道德的人，都必須認識道德教育對國家人民的影響力。即宗教的再教育。」

(四)新近當選美國的唯一女州長伊拉·關娜素說：「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具有輝煌的傳統，適中的人口，而且所有的美國人都在為人類最高的理想而奮鬥。美國的偉大歷史也幫助美國人民更進一步體認自由與民主。」

(五)約翰洛克斐勒三世說：「美國人民應體認基本價值觀念的重要，從歷史中得到教訓，促進社區的活動和生活，立下目標而為前途奮鬥。主動、積極、勤勞，才是美國立國初期的基本精神。」

(六)基督教箴言報榮譽編輯認為：「要協力解決面臨的問題，美國人應該更敏銳的探討今日美國的生活方式，同時應以更實際的奉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再奉獻的觀念可以引導美國人民走向一七七六年偉大的純樸傳統中。國家的生命並不是基於自我的沈溺，漠視法律，不重秩序，和缺乏社會正義。美國人民應恢復傳統的觀念，這是飲水思源、造福子孫的最佳途徑。」

以上簡要地分析了美國問題與國際問題的關聯——是以實證方式來解釋他們的存在（What Is），現在我們應該談一談價值上的問題——美國應該如何協助解決國際問題（What ought to be）以及與其本國問題之連帶解決的方法。

(一)現在世界上或是明日世界的問題中，最實際、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問題，就是在許多國家地區當中，有些是開發了的，有些是正在開發中，我們不能否認所謂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我認為還有一個第四世界，

包括了四億到八億人民，營養不足，每年每人平均收入，最低是五十六元美金，最高是二七五元美金，在這個地區裏面，人民的生活水準比開發中國家落後二十年，其中四〇%以上兒童的壽命不及五歲，半數以上的人口未受教育。試問這樣一個世界的問題存在，美國應該做什麼？這是世界的問題？還是別人的問題？

(二)美國應該認為也只有世上其他國家都在自由、安全、繁榮時，美國才能維持他們的自由、安全及繁榮，因為今天變成了現實的自然力，相互依存的關係是太密切了。如美國不援助那些國家，那些地區的貧窮、無知、匱乏將促使共產主義之滋長，使暴力坐大，最後導致世界不安寧及毀滅，我相信這應該是美國人所不願意看到的。

(三)明日世界所將面臨之種種需要及難題，美國必須與依循人類相互依存之重要性，領導國際合作，協助他們，再度以美國傳統的道德精神力量，建立自由世界的威信，促進不僅是美國人的自由，而是全人類的自由，追求不只是美國人的幸福，而是自由世界的幸福。我們謹希望美國在建國二百年前夕能虛心誠意地檢討自己，尋出問題之所在，將美國自己的問題與國際的問題關聯起來，重新加以檢討，決不可以美國的利害為唯一取捨，要以整個自由世界利害為取捨才是原則。

註① “Ways Other Countries are Coping with Unemployment,”

U. 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3, 1975), p. 58.

註② “Down the Road—Better Times But a Few Bumps, Too,”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 3, 1975), p. 37.

註③ “Adapting to Hard Times—Americans Change Life Style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27, 1975), p. 22.

註④ Ibid., p. 21.

註⑤ “Colleges Go into Business to Make Ends Meet,”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27, 1975), p. 34.

註⑥ 見拙作「美期中選舉結果分析」中央日報六十二年十一月八日。

註⑦ “The 94th Congress: Younger, Restless, More Liberal,”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20, 1975), pp. 27-28.

註⑧ “Big Job Ahead for U. S.—Holding on to No. 1 Spot,”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 3, 1975), p. 40.

註⑨ Ibid.